



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
选登 >>
福建省首届外事翻译
研讨会论文选登 >>

翻译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的和谐统一

——从认知角度看翻译过程

于海岩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中国福建 361005)

摘要: 历来指导翻译行为的翻译观, 在与哲学世界观同步发展的进程中皆持有各自迥异的方法论, 分别围绕“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本文尝试将翻译过程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从认知科学和文化语义学的角度, 探索和谐处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翻译方法论。

关键词: 翻译观; 社会文化背景; 认知科学; 体验; 互动

Integrity and Harmony among Author, Text, and Reader in Translation

Yu Haiyan

(Xiamen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Synchron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schools, different outlooks have been guiding translation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Thus,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author-centered translating, text-centered translating, and reader-centered translating kept going over decades. Set in the general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consider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cultural semantic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an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method to achieve harmony among author, text, and reader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outlook; social-cultural context; cognitive science; experience; interaction

在翻译实践的众多探索中, 作者、文本、读者一直都是每一个译者在有意识, 甚至是无意识的情况下, 不得不面对, 并且需要对其进行慎重考虑的三个重要的因素。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轻重关系, 使得译文既忠实于作者、原著, 又同时满足读者的需求, 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长期以来, 围绕着这个问题, 在文学欣赏、文学批评等相关领域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 不同时期的翻译家们对此各持己见, 分别提出有着不同侧重点的翻译观。温故而知新。通过再度审视以往的翻译观, 分析各自的优点与不足, 可以辅助我们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独辟蹊径, 找寻到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决办法。本文尝试从文化认知能力的角度, 结合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 探索使以上三者的关系得以在翻译作品内趋于和谐的途径。

西方社会的哲学发展一向被视为其他众多学科发展倾向的中心坐标。哲学的发展可以基本上反映出当代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出现的新特点。可以说，哲学与其他各门学科是同步发展的。同样的，翻译研究中也会体现出哲学发展的轨迹。西方哲学中出现过三种不同的主要观点：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理论。这些观点给翻译研究的发展倾向带来很大的导向作用。整个翻译过程，即分析原作，理解作者意图，并旨在满足读者需求而完成的一次由源语到目的语之间的转换。很明显，当考虑进作者、文本、读者的因素时，整个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转换，更包涵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丰富内涵的交流。译者的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是一个连接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的一个纽带。虽然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直接的媒介应该是著作文本——作者与原著，译文与读者，但其中关键的一环——原著到译文的转换——却是通过译者与作者、文本及读者进行积极的交流与互动来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翻译过程中，在不同的情况下，作者、文本、读者三方面因素所受关注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译者到底更应该关注什么？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不同的翻译观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

传统的翻译理论，因受到二元对立论的认知主体哲学的影响，特别注重作者与文本的作用。

“作者中心论”认为译者应当对原著作者给予最大的尊重，作者是主人，译者是忠实的仆人，译者扮演的只是一个鹦鹉学舌的角色。而语言则被简单认为是一种用来准确反映外观世界的镜像工具。因此，好的翻译是忠实的、不存在任何偏离的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通常采取直译。

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唯理论的翻译观，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文本本身。唯理论者将语言研究视为一种纯理性的行为，语言是以人的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为围墙构建而成的封闭系统，意义是由语言内部要素所确定的，具有确定性。然而，不论是以作者抑或是以文本为中心，都对译者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既然对作者需要无条件的服从，对文本要完全的忠实，而且语言也被预设为可以准确反映原文及作者意图的工具，那么没有“完全合乎要求的”译文自然是译者的错。

20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解释派哲学，翻译观也相应地开始转向对语言重视和研究。此时的语言已经不再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中介的工具那么简单，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去重新审视语言的地位和作用。语言的文化家园被得到了肯定和认同。译者，作为一个认识主体，进一步地介入翻译过程，主观性的因素更多地出现在译文中。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立场自然亦存在差异，就像十个人读《红楼梦》会有十种理解一样，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也就出现了各自不同的版本。而且对译文的考虑也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读者的反应。在这一浪潮中亦出现了不少极端的观点，认为“读者至上”，译者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更有甚者提出了“作者死了”的口号，即所谓的解构主义倾向。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翻译观的发展经历了长久的变迁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似乎在处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时候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在以往的翻译观中，作者、文本、读者之间仿佛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译者则夹在三者中间往往顾此失彼，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论偏重于哪一边都会遭到非议。

二、从认知角度看中西方文化的差距

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正确发现问题的所在。译者之所以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菲薄与批评，原因在于其翻译作品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不管这种期望是否过于偏颇。对于原著，译者是否未能事先对文本的内涵进行充分理解就枉自揣测？对于作者，译者是否还未熟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阶级立场就匆匆下笔？对于读者，译者是否还未考虑到阅读人群的欣赏水准和审美情趣就乱译一通？暂时撇开个人语言功底不谈，如果尚未从这三方面做好基本的译前准备，那么出错在所难

免，遭人非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评价一个译者，最直接的就是将译文拿来审阅、品味。而对于其在翻译作品时的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抑或是显赫的业内地位，我们最多也只会象征性地赞扬一番。这一点无可非议。然而，真正全面客观地评判一项翻译工作的优劣，除了阅读译作之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整个翻译过程。对于普通的读者，眼前的译作仅限于一本书，一种产品；但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译作体现的更是译者完整的决策过程，译作也同时构建了不同语言文化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Bell R. (1987) suggests that ... If we treat text merely as a self-contained and self-generating entity, instead of as a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and an instan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language us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ng will be impaired.”译文之于原著，译者之于作者，双方各自的思想、意图与感受的碰撞皆在译文的字里行间激起耀眼的火花。文字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在对文化进行着诠释。语言再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它亦然有自己的归属和精神家园。

受20世纪欧洲解释派哲学影响的翻译观认为，认识主体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与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而文本中所体现的主观因素也随之凸现出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认知的角度来说，文本其实是一种“为目的所驱使的语言表达”。无论是原著的作者，还是翻译工作者，在各自进行着文字表述的时候，必然会反映出各自对周围生活环境，乃至整个文化背景的感受与体验。认知语言学里目前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人类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它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必须从体验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文本中隐含的带有作者和译者主观色彩的成分可谓丰富多彩的。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和语义层面，可以读出反映不同文化内涵的意图和主观见解。比如，在东方文化里，猫头鹰，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夜猫子”，一向都是人们极为憎恶的生物。因其叫声诡异，外形凶猛，被看作是不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人的眼中，“owl”却是智慧的代表。因为“Owl is a bird of Minerva.”(猫头鹰是智慧、技术和工艺之神)。因此，“owl wise”意思是像猫头鹰一样聪明的，“owlish”是像猫头鹰一样面孔严肃的意思，它代表的是一种在科研与治学中的严谨的形象。在德语中，“Die Eule”亦是智慧与博学的化身。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到中国金店里不要金龙金鸡，却偏偏想买金猫头鹰了。对外在事物与环境的认知体验与感受，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人类的生理结构基本相同，但是不同的人类群体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对同一事物的描述却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周边环境里，更加可以通过各自语言不同的描写特点而得到完美的再现。而这些反映到语言层面的差异，归根结底，则是由不同人群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地域文化中形成的不同的认知能力造成的。

三、翻译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的互动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譬如，借用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将一个平常的语句放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将语言外的背景（像话语交流的参与者数目、正式程度和进行中的活动的性质等），以及相应的社会情境的变异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定因素统统考虑到翻译的具体过程中来，那么即使是一个字数不多的句子，如果要考虑周全，翻译出来恐怕也要费上相当大的工夫了。那么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正视的是，究竟该如何跨越不同语言文化间的鸿沟呢？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强译者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这一点可以采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解释：不同的物种，由于生理结构不同，比如说视网膜的构造不同，在其大脑中所呈现出来的图像也必然不同。研究清楚其它物种的生理结构，自然就可

根据其特性模拟出在其大脑中呈现的相类似图像。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可以同时掌握两种人群在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各自不同的认知模式，就可以在其中一种人群的认知系统中真实再现另一种人群的认知图示。这一点不正是翻译工作一直在追求的效果吗？翻译正是力图通过文本的途径来向一个人群传达另一个人群的认知图示与心理活动的。

而此处探讨的加强译者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译者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理解源语文本中的涵义（包含表层涵义和深层含义）。务必抓住原文的精神，完全领会作者的意图。正如G. Steiner (1975:298): “The translator invades, extracts, and brings home.”应当清楚地看到，译者在处理原著文本时所作的每一次省略、增译、改译，都是基于译者主观意识选择之上，来进一步取得最佳转述效果的策略。译者的最终目的是将原著形神兼备地奉献给读者。当谈到效果，则必然要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与期望，预先揣测读者的反应，即译文措辞是要根据读者的接受度与立场来做出最终选择的。译者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应该时刻照顾到读者的利益，即使是读者群较为狭小的科技论文，如果译出连业内人士也听不懂看不懂的文章，那么这次翻译活动就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一点看，说翻译是受“他人利益”驱使的行为也毫不为过，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服务。这里更加复杂、却同等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正确处理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由于两者所处时代不同，归属的文明亦不同，在原著作者笔下可以雅俗共赏的东西一旦进入译入语文化中就要做相应的隐晦的处理。这一翻译策略在英译汉翻译中显得更为重要。比如，美国文明在经历了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思潮等一系列变革之后，对于像性，同性恋等话题，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作禁忌语，但在西方民众中却享有更高更广的接受度。一部原声的好莱坞大片就足以说明问题。新近走红的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Broback Mountain* 更是将同性恋之间的爱情直接搬上了荧幕，并且的确已经为大众所接受。这在保守的传统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很多作品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为了促进国内人文科学研究的发展，与世界同步，译者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将优秀的作品引入中国，而对于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的部分也只能做一些低调处理，效果也会不错。毕竟瑕不掩瑜嘛。

结语

强调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同样要看到翻译本身所具有的主观创造性的特征，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主体行为，对原文的理解与诠释也来源于译者本人在自己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亲身体验。我们常说，学外语的就要到国外体验一番，不仅仅是为了开拓视野，更是为了获得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事物的认知模式。古时孔子为编写《诗经》而足迹踏遍春秋列国。“采风”，作为一种“认知”与“体验”异域文化的有效手段，早在几千年前就得到了肯定与应用。且今不为吾所用，将待何时？

注释

[i] 参见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

[ii] See B. Hatim,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P3

[iii] 同1

[iv] See B. Hatim,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P11. Quoted from G. Steiner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 廖晶 朱献珑. 论译者身份[J]. 中国翻译, 2005 (3)
- [2] 邵志洪. 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 [3] 王宁. 翻译的文化构建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走向[J]. 中国翻译, 2005 (6)
- [4]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2005 (5)
- [5] B. Hatim,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1997
- [6] Roger T. Bel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1

[联系我们](#) | [协会地图](#) | [合作单位](#) | [协议下载](#)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福建省翻译协会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97号省外事大楼702-703室 邮政编码: 350003 电话:0591-87827338, 87873331, 87876953